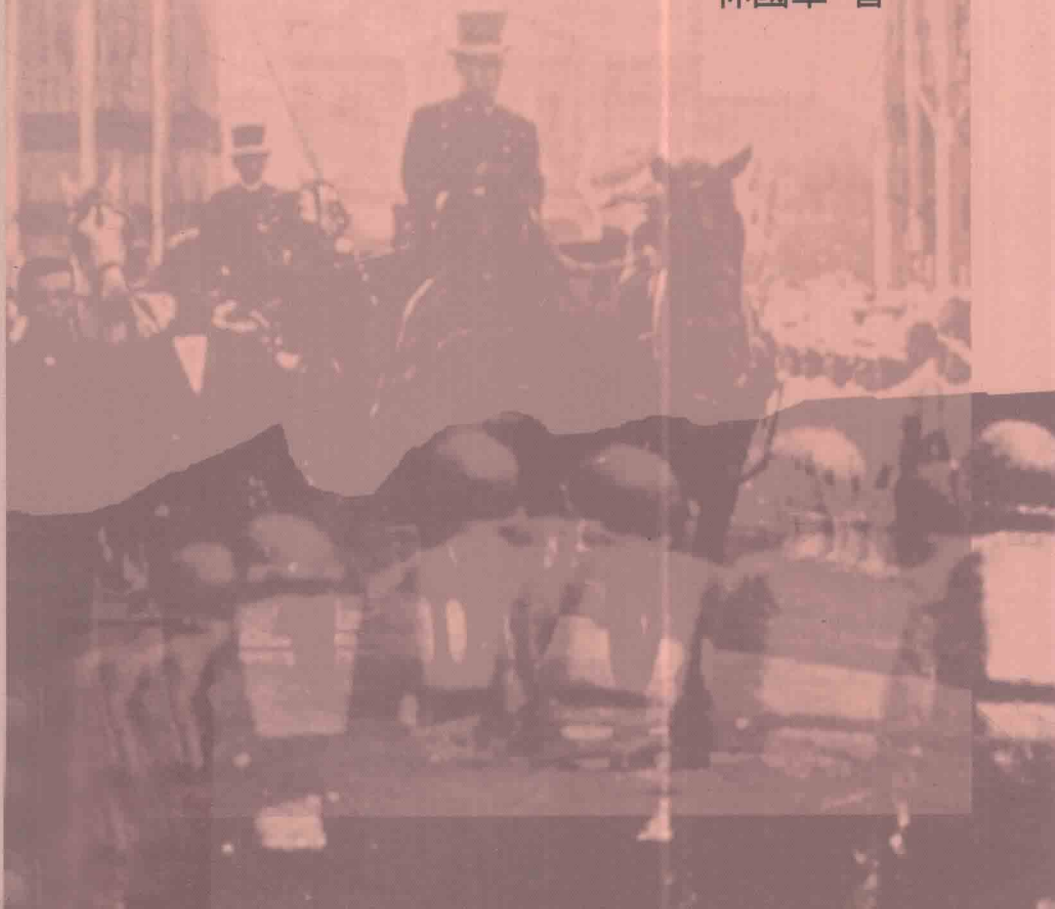


民族主義與 台灣抗日運動

1895-1945

林國章 著



民族主義與台灣抗日運動

(1895～1945)

林國章 著

民族主義與台灣抗日運動（1895～1945）

著者 林國章
發行人 黃溪南
主編 洪宜勇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地址 (116) 台北市景興路 193 號 4 樓之 7
電話 (02) 86632559 傳真：(02) 86632466
劃撥帳號 19389534 戶名／海峽學術出版社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100) 台北市師大路 165 號
電話 (02) 23677878 傳真：(02) 23677432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5)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 2 段 336 巷 10 號 10 樓
電話 (02) 22496108 傳真：(02) 22496103
香港總代理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30 之 32 號華耀工業中心 14 樓 10 室
電話 (852) 26875898 傳真：(852) 26875005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 37-39 號地下
電話 (853) 581418 傳真：(853) 581425
排版所 宜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02) 23661745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02) 22733643
出版 2004 年 6 月
定價 320 元（平裝）
ISBN 957-2040-89-8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民族主義與台灣抗日運動（1895～1945）／

林國章著 一初版一，一

台北市：海峽學術，2004〔民93〕

面； 公分

ISBN 957-2040-89-8（平裝）

1. 台灣—歷史 2. 日據時期（1895-1945）

673.228

93006722

序 言

台灣研究結合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趨勢，是當前學術界倍受重視的熱門課題。尤其在 2000 年的總統大選出現政黨輪替的變局之後，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如何建立以台灣為本位的思考，隨著政治活動的推波助瀾，浮現在學術、文化層面，成為與民主化併行，深刻影響台灣社會集體認同與社會動員的一股力量。其中無論是以所謂台灣民族主義或是新台灣人主義…等不同詞彙，抒發看似各異的不同論述，本質上均充斥著以台灣人民的意志為中心的觀點，以之用來解釋台灣過去的歷史以及文化發展的現象，致使當代台灣的本土化論述淪為蘊蓄去中國化及夾帶濃厚政治意味的意義。

然而學術研究仍應回歸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於台灣本土意識的探討，不能忽略本土性乃是對應於外來性而存在，這是邏輯思考的應然與實然。以之審視台灣歷史發展的軌跡，則中國因素究竟是構造台灣歷史深層結構的重要內涵，或只是帶給台灣社會脅迫的外來壓力？此一判斷之如何拿捏，不僅攸關時人如何開創台灣未來的發展新局，更是治史者必須客觀面對以免偏頗失據的重要問題。

國章君從事與民國史有關之研究及教育推廣工作多年，最近完成《民族主義與台灣抗日運動 1895-1945》一書，內容除了闡明 1895 年台灣被迫割讓淪陷為日本殖民地之際，台灣人民風起雲湧前仆後繼奮起抗日的義舉。更重要的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探討二十世紀前葉，

台灣地區反殖民抗爭的民族運動結合中國抗日民族主義運動相應互動的歷程，並從政治、社會、文化等不同面向呈現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與認同歸趨。行文條理清晰、論證周延，是為之序以誌嘉許，並期為學持續努力，日益精進。

陳昭仁 2004.4.12

自序

民族主義頌揚效忠民族，是最具力量的一種意識形態。過去幾百年來，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一樣，成為廣泛影響人類生活與思想的一種政治思潮。它具有凝聚認同感及強化團結的效果，也可能是激化族群政治對立衝突的根源。

台灣社會自 1980 年代以來，由於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的大幅進展，本土化議題在對抗威權的聲浪中，隨著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推波助瀾以及社會動員範圍的擴大，造成台灣社會浮現政治認同的極大分歧。而學術研究在禁忌解放之餘為了建構以台灣為本位的歷史圖像，也發揮反對所謂外來政權和反殖民的歷史論述。1895 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被視為台灣意識的萌芽以及追溯台灣民族主義的根源，台灣民族主義則成為觸動當代台灣族群互信與影響兩岸關係分合緊張的發條。究竟日據時期台灣抗日民族運動是否實踐了台灣自主的某種實質意義，成為本書探討的核心。

為了揆度民族主義歷史發展的現象，迴避情感與價值因素的迷障。行文採取歷史社會學的觀點，參照有關民族主義及社會運動先驗性的學理見解，歸納中、台兩地民族與文化系統的源流，並融合當時國內外因素以及民族自決理念、社會主義學說、日本的侵略和台灣的社會結構等因素。綜合分析日據時期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與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交疊互動，同樣都是以反帝、反殖民、爭自主為目標，具

有承先啓後、同仇敵愾的連貫性。希望回歸是山就是山，是水就是水的歷史面貌。寫作期間承蒙尊師楊逢泰教授、周陽山教授多方督促，更有幸獲得陳鵬仁教授、陳三井教授、王曉波教授、尹章義教授殷殷垂詢，尤其王老師惠示許多修正意見，至深感謝。此外，也要對海峽學術出版社洪主編宜勇兄的熱心協助，促成本書得以付梓出版，表示由衷謝意。只是筆者學驗淺陋，論證不週或遺漏之處所在多有，仍請讀者先進不吝指教。

林國章 謹誌 2004.4.12.

民族主義與台灣抗日運動 (1895~1945)

目 次

自 序

第一章 問題意識與分析架構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立論基礎	22
第三節 分析架構	52
第二章 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背景因素	58
第一節 文化與民族意識的傳承	61
第二節 日本對台灣的侵略統治	82
第三節 中國局勢對台灣的啓示	93
第四節 國際因素對台灣的影响	102
第五節 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結構	109
第三章 武裝抗日時期民族運動表現的內涵	121
第一節 反對清廷割讓台灣	121

第二節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	129
第三節	前仆後繼奮起抗日	142
第四節	響應中國革命運動	172
第四章	非武裝抗日時期民族運動的形式與方向	182
第一節	知識社團崛起號召	182
第二節	政治的結社與請願	204
第三節	社會教育改造運動	229
第四節	農民勞工抗爭運動	243
第五節	左翼共產主義運動	261
第六節	本土的新文化運動	276
第五章	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困頓與轉折	290
第一節	抗日運動路線分裂	290
第二節	日本擴大侵略戰爭	309
第三節	皇民化措施的遺害	317
第六章	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變遷效應	323
第一節	台灣延續國民革命的香火	323
第二節	台灣響應祖國的抗日運動	335
第三節	新文學運動延續抗日精神	341

第四節 台灣意識增強本土的認同	346
第七章 結論	353
第一節 台灣抗日運動以漢人民族意識為基礎	353
第二節 台灣抗日運動與中國民族主義相呼應	361
第三節 左翼勢力並未實踐台灣民族主義運動	366
第四節 日據時期文化運動開啓本土化的辨正	368

第一章 問題意識與分析架構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壹、民族主義認同分歧影響兩岸關係也是台灣研究的首要課題

1993 年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發表《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論文，闡述不同文明背景的衝突將取代因意識形態或經濟因素所引發的紛爭，成為新世紀國際事務的核心。並強調西方文明必須審慎保持優勢，以對應非西方文明勢力存在的論調，曾經引起世人諸多議論。但不可諱言，世界各地由歷史、語言、傳統及宗教信仰所形成根深柢固的文明差異，隨著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的過程，正在各自強化其個別的「文明意識」(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以至於許多非西方國家中的菁英都在苦心致力「反西化」(de-westernization) 及倡導「本土化」(indigenization)，以回歸其本位文化的傳統，從而釀造了全球性民族紛爭與國際間的恐怖暴力。¹ 這種千禧新世紀的亂流，較之冷戰時期的超強對立，相對更值得世人重視。

杭廷頓的洞見強調文化同質性的重要，認為不同文化實體的族群衝突與文明的衝突將取代超強的對立，是新世紀世界政治的主要格局，並且視民族國家仍是世局的要角。他以東、西德及南、北韓為例，舉證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分道揚鑣的人民，卻因文化而凝聚在一起，進而預測兩岸三地的中國人也將踵武這種模式。²

¹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vol.72, No.3, 1993, pp.22-39。

²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這種見解指出了文化因素是民族主義的核心，也是達成國家整合的基礎。實際上從「原生論」（Primordialism）或是所謂「本質主義論」（Essentialism）的立場而言，由共同的歷史、血緣、文化所建構的原生性情感的確是民族認同的基礎，它是既定不變的。³ 但是民族主義研究的另類觀點，從所謂「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或是「建構論」（Constructionism）的角度來說，雖然並不否認血緣共祖意識形態（ideologies of biological descent）的力量，但更強調認同必然是以理性的選擇（rational choice）為考量。因為無論是族群或是民族認同的建立，基本上都具有工具性的傾向，為了爭取利益，適應情境或環境的變遷，認同不但可以隨著調整與改變，更可能由族群菁英為了資源競爭或是特殊的政治性目標而積極推動建構。⁴ 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動以及二十世紀諸多民族國家的建國運動，尤其在致力脫離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歷程中，族群動員（ethnic mobilization）的基礎幾乎都與抗議不公平，或是追求共同利益的工具性集體意識緊密相關。

顯然單純以文化同質性的因素，並不足以說明當代國際社會中民族與國家實體必然能順利的整合。而杭延頓從現代化與全球本土化的進程，分析非西方文化的復甦及西方壟斷時代的即將過去，雖然足以警醒世人重新思考民族與文化問題的重要性。但要以此樂觀地預測台海兩岸的中國人民也將聚合的遠景，基本上似乎忽略了民族主義現象在中國現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年初版），頁6～7。

³ Greertz, Clifford.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p.105-157。

⁴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台北：中正書局，民國80年初版）頁16～20。另參閱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衛出版，1998年），頁10～11。

代史上發展分合的苦痛，同時也涉及社會科學研究上，如何將國家與民族這兩個客觀性觀念，適切用為衡量現狀的立場問題。因為無論是從民族或國家的角度論述，中國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中華民國的存在也是事實，台灣問題無異是構成揭穿此種客觀性的最大挑戰。⁵ 所以儘管中國大陸自 1980 年代以來不斷擴大與深化改革開放措施，急遽的資本主義化，其結果一方面使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逐漸沒落；另一方面兩岸人民隨著旅遊、探親、經貿、學術及文化交流的擴大，無論意識形態或政治經濟發展，正在緩慢趨同之際，但是兩岸關係不但未顯彌合，反而是不斷擴大間隙。就台灣而言，這是受制於方興未艾的分離主義運動，社會上明顯呈現出「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的分歧與困境，⁶ 而最嚴重激化兩岸之間政治矛盾的則是以台灣人自決，或是以獨立建國為號召的「台灣民族主義運動」(Taiwanese nationalism)，⁷ 民族主義

⁵ 在社會科學研究裡，隱藏了民族應該由國家管轄，國家應由民族組成的兩個立場。中國作為客觀存在的國家與客觀存在的民族，是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研究中國的前提，也是中國民族主義發生的論述基礎。但是台灣問題則揭穿了國家與民族的不可定義性。因為台灣國家性質的流動，已使得做為國家與做為民族的中國失去其客觀性。參閱石之瑜，〈民族、民族研究、民族主義：兼論作為意識形態的社會科學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4 期，（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民國 90 年 7、8 月），頁 109。

⁶ 由於英文的 nation 指涉的意涵可以是「民族」或「國家」，而當一個民族以追求獨立自治、建立國家為目標時，nation 也可以被理解為「國族」或「族國」。因此，一般對於「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的理解，常出現「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或「國族認同」的糾葛。事實上 national identity 確實是西方學術界討論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時必然涉及的重要觀念。但學者江宜樺則認為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主要並不是西方民族主義文獻所談的獨立建國或打造國族問題，而是台灣做為一個實質存在的國家應如何自我定位，及其人民應如何確認自己歸屬範圍的問題。近代台灣存在認同的課題針對的是國家而不是民族，因此 state identity 才是台灣認同問題的核心。參閱江宜樺，〈新國家運動下的台灣認同〉，收在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2001 年），頁 189～190。

⁷ 王家英，〈從殖民統治到分裂國家—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王家英、孫同文主編；《從台灣政治到兩岸關係》，（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出版，1999 年第 1 版），頁 141～142。

認同分歧乃成為影響兩岸關係的深層結構問題。

在當代社會科學論述中一般視認同為一種建構的過程，這種自我之建構，包含了自我的反省、解釋與敘述；其在政治實踐的層面，政治認同訴求的是群體共同的、長遠的政治目標；在文化方面，則往往是以這個政治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族群之文化形態，作為認同之基本參考系統，並且透過歷史的闡述與建構，形成敘述性格的文化認同。⁸ 而凸顯台灣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差異的肇因，則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一）一方面是因為過去一百年以來，與中國政治體系實際整合的時間太過於短暫，以至於無論政治管轄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記憶均有不同的發展方向。⁹

（二）另一方面是台灣社會自 1980 年代以來，民間社會力量的勃興，展現對以往政治掛帥和經濟掛帥的反彈，而抒發出民衆對「社會現實」強烈的自主性格。¹⁰ 其間尤其以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為基本綱領之「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¹¹ 以及 1987 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令。結果促使社會大幅趨向多元化的形勢發展，也使得政治治理之效能，已不再像過去一樣能夠完全統攝與支配公民日常生活之所有層面。

（三）第三方面是在野的反對運動團體為發揮「結構性的抗衡力量」（structural leverage），並建構「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的意識形態基礎，利用民主化的政治轉型過程，不斷提出強化本土化的訴求目標。於是從支援弱勢團體、反對政治迫害、國會全面改選，到訴之

⁸ 蔡英文，〈認同與政治——一種理論性之反省〉，《政治社會科學論叢》，（國立台灣大學出版，民國 86 年 6 月），頁 55。

⁹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台灣政治學會，1996 年 7 月），頁 8。

¹⁰ 蕭新煌，〈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收錄在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出版，民國 78 年 1 版），頁 21～46。

¹¹ 2001. 11. 1. <http://newcongress.yam.org.tw/dpp/programme.html>。

省籍情結，要求住民自決，乃至於台灣獨立等議題，都成為策動群眾運動最有力的訴求內容。從而挑起了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對立。¹²

誠然有關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源自歷史結構的共同記憶，同時也是群體對未來的理性選擇。當代台灣社會的省籍情結與國家認同的糾葛，除了統獨二元對立的情境，無論是以：「台灣人」、「中國人」，或「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為認同基礎，事實上存在著「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獨立論」、「務實統一論」、「中國民族主義」、「務實現狀論」等不同類型的主張。¹³ 其中無論是激進的台獨主張，或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擁護者。隨著民主化的發展以及政權立基於選舉的制度化操作，絕大部份的台灣民衆均不否認台灣是一個具有國際地位的政治實體，也不排斥與中國大陸交往，以建立合作及互助互利之關係。但是一旦論及主權和未來國家發展的遠景，卻仍明顯存在與中國大陸整合（towards integration with Chinese mainland）及尋求獨立建國（towards independent statehood）等二種截然不同的立場。沒有人足以強勢的引導與調和這種兩極化的現象，使得台灣社會浮現出「鬆弛的民族國家連結」（Loosening the nation-state link）與「後民族主義認同」（post-nationalist identity）的情境。¹⁴ 以致於在兩岸的血緣、文化、經濟融合與政治脫鉤的情境中，民族主義的集體認同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擺盪，並成為實質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

¹² 參閱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1979 至 1989 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台灣政治學會，1996 年 7 月），頁 129～209。

¹³ 同註 6，江宜樺，前引文，頁 191～200。另參閱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前衛出版社，1998 年初版），頁 171～211。

¹⁴ Christopher Hughes, "Post-nationalist Taiwan", in *Asian Nationalism*, Edited by Michael Leif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63-81。另參閱濱下武志，〈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出版，2000 年），頁 25。

深層結構問題，¹⁵ 這是當前台灣社會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貳、探索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圖像

重繪歷史的圖像，以古鑑今是歷史研究的致用性目標。但是所謂再現過去，實務上往往只能是依據那些帶有主體性和主觀性的各種史料，經由歷史學家同樣帶有主體性與主觀性的進行取捨選擇與價值評估，再依一定的因果關聯加以拼湊。以致於隨著史料存在狀況的不同和史學家對史料處理方法的不同，所再現的過去事物也會呈現不同的面貌。¹⁶ 為了彌補這種缺失，當代社會科學的「務實的實在論者」(practical realism) 轉而強調研究者在考究往事記錄與解釋史料時，應力求真確與完整。必須緊盯檔案記錄的細微末節，妥慎的安排敘事解說的主配角地位，並且發揮美學吸引力，恰如老式畫家喜歡寫實主義一樣，將腦中出現的事物重構再現。¹⁷ 但是，只要存在重繪歷史的圖像必須依循過去記錄才能重現的本質不變，歷史的論述還是很難避免「就其他論述作論述」(a discourse on other discourse) 的陷阱。因此，為了避免歷史化的思考流於浮誇或虛構，「史觀」、「史識」，與「史德」，就成為判別歷史論述是否中肯的基準。而其中如何確立演繹及解釋歷史事件的立場，並藉由教育傳播的擴散，以建立大眾共同信認的史觀，或共同的歷史意識，從而凝聚全體國民的歸屬感，強化「想像的共同體」的意志，乃成為政府或國家的基本要務。以美國為例，獨立戰爭的勝利並未立即造就成完全整合

¹⁵ 石之瑜，《兩岸關係的深層結構—文化發展與政治認知》，（台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民國81年），頁133～286。

¹⁶ 木村尚三郎著，上官天逸譯，《重繪歷史的圖像（歷史的發現）》，（台北，宏觀出版，1996年），頁6。

¹⁷ 喬依絲·艾坡比 Joyce Appleby、琳·亨特 Lynn Hunt、瑪格麗特·傑考 Margaret Jacob 合著，薛絢譯，《歷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第3版），頁228～229。